

光辉历程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让亿万中国人告别饥饿

——访率先摘下“公社”牌子的向阳镇

较早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的四川省广汉市向阳镇去年全镇人口突破6万,而工业总产值突破100亿元,国地两税入库税收2.3亿元,这个经济较为发达、楼房林立、百姓生活小康的乡镇,还被评为“国家级生态乡镇和国家卫生镇”。但在36年前,这个当时以务农为主业的乡镇和全国农村一样,许多百姓难得温饱。

穷则思变。1980年,向阳镇在全国第一个摘下“人民公社”的牌子,揭开了包括当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等农村改革的序幕。

如今,向阳镇从昔日农村小集市发展成为成都市、德阳市边界上的一颗明珠。一条条道路四通八达,一座座高楼拔地而起的向阳镇,彻底告别了36年前挥之不去的饥饿和贫穷。

向阳镇的变化堪称36年来中国农村变化的一个缩影。1970年出生的钟敏清楚地记得,那时她虽有个当干部的父亲,可家里仍揭不开锅。自己童年最大的阴影就是饥饿,瘦得被叫做“干线儿”。直到1981年包产到户,才吃上人生第一次油炸馍馍。

钟敏等“70后”记得: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经营管理过于集中,分配上存在着严重的平均主义,不利于调动农民的积极性,致使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农民生活的改善比较缓慢。1978年,我国有1亿多农民没有解决温饱问题。以向阳镇为例,1959年到1979年间,当地粮食生产年平均低于1958年,农民年分配现金仅18.85元。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成为当时党面临的重大课题。

当时,为了解决温饱问题,一些地方的农民大胆改革;广汉县金鱼乡1978年秋实行包产到组。同年12月,安徽凤阳县梨园公社小岗生产队18户农民在大包干契约上摁下手印。四川、安徽的农村改革,很快得到云南、广东、贵州、河南、山东等省的响应。但有一道难关横在面前:“人民公社”怎么办?

向阳公社先是把干部划分为行政、农业、乡镇企业3个班子,实际上打破了“人民公社”政社合一的体制。随后在1980年4月,向阳正式取消“人民公社”牌子,恢复了“向阳乡人民政府”建制。

1980年,中央明确提出在农业领域普遍建立各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到1983年底,全国农村基本实行了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1984年,中央提出土地承包期一般在15年以上。此后,多份中央文件确立了农户为农业经营的主体,赋予农民长期而有保障的土地使用权和经营自主权,几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迅速调动起来,短短几年农业生产就迈上一个大台阶。

正是有了稳定的土地使用权和经营自主权,农民才得以从土地上解放出来,进城务工,促进了我国工业经济的发展和城镇化。

随着时代发展,向阳镇绝大多数村民都已成为城里人,分享着农村改革和城镇化带来的红利。瓦店村80岁的村民官斗莲,如今住进农民新居,按月领取1300元社保款项,还用土地款给儿子买了一辆汽车跑运输。

我国政府领导人2014年在联合国粮农组织演讲时感慨地说:“30多年前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就是从农村改革开始的。我们通过改革实现了农业大发展,粮食产量由3亿多吨增加到6亿多吨,成功解决了人民的温饱问题。在此基础上,几亿人摆脱了贫困,并提前达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

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要内容的农村改革极大地解放了农村的生产力,为此后工业经济领域的改革发展奠定了基础。中国以7%的土地养活了约占全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创造了世界减贫史上的奇迹。

文/新华社记者 谢俊 (新华社电)

山西武乡:

弘扬太行精神 彰显红色优势



在武乡县八路军太行纪念馆,党员们在重温入党誓词(6月28日摄)。

革命老区山西省武乡县是太行精神的重要发源地之一,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曾在这里长期战斗和生活,组织指挥整个华北地区的抗战。近年来,武乡县以弘扬太行精神为主线,充分发挥红色资源优势培育八路军抗战历史缅怀、八路军文化精品演艺等红色文化品牌,全方位打造全国著名的红色旅游基地、全国最大的八路军文化基地和全国知名的红色文化产业基地,走出了一条革命老区转型跨越发展的新路。2016年上半年,武乡县旅游接待159.34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18.15亿元。

新华社记者 燕雁摄

延安:新型城镇化之路越走越宽

本报记者 雷婷 张毅

“幼儿园投资800万元、建筑面积近4000平方米,每个教室面积均超过110平方米,教室内钢琴、电子白板等现代教育设施一应俱全。”石头镇中心幼儿园园长雷巧红说。

“十二五”期间,延安市教育累计投入285.4亿元,年均财政性教育经费超过50亿元,均超过当年GDP的4%的比例。校舍建设和设备购置共投入30.6亿元,全市新建和改扩建幼儿园158所,中小学166所。城乡教育整体面貌显著变化,各级各类学校办学条件全面改善。

按照“居住集中化、环境生态化、设施城镇化、管理社区化”的要求,延安结合新型农村社区资源条件、地理位置、产业基础等,把新型农村社区分为城镇依托型、企业带动型、产业支撑型、移民安置型和中心村辐射型五种模式。各社区结合村级组织场所、文化室、卫生室、警务室等建设项目,采取新建、改建、置换等方式,配套完善了社区综合服务中心、便民超市、农业综合服务站、幼儿园、老年活动室等公共服务设施。

6月21日早上8点多,59岁的韩海平来到姚店镇中心卫生院就诊。患有冠心病的韩海平是卫生院的“老病号”。B超、心电图室医生李文娟马上为其进行心电图检查。上级托管医院配套的笔记本电脑屏幕上很快显示出了患者ST-T异常。为尽快确诊病情,李文娟将心电图检查结果同步传输到上级托管医院延大附院东关分院心内科,进行远程会诊。不到5分钟,东关分院心内科主任任青就打来电话询问病人的既往病史。

“虽然姚店离城里也不远,但镇上看病更方便、更便宜。看的是同样的医生,一天药钱才一二百元,农合还可以报销90%。”韩海平感慨地说。

近年来,延安通过组建医疗集团,

陆续启动了延安大学附属医院、西安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等三甲医院对县乡医院的托管,让老区群众享受到优质的医疗服务。

2011年,延安在陕西省率先推动建立了一体化的基本社会保险制度,打破城乡二元结构,消除了制度壁垒。随着全市经济的持续发展,社会保险也在逐年调整提高。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由最初的70元提高到目前的125元,企业退休人员养老金实现了11连调;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补助每人年均增长50元,目前已达400元;失业、工伤保险待遇标准也在逐年调整提高,社会保险基金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

记者见到宝塔区甘谷驿镇组织委员冯宇的时候,她正在核验收刚做好的带有“甘谷驿古镇”商标的定制包装。一个月后,甘谷驿红薯、甜瓜等土产品就要上线预售了。

延安市甘谷驿镇特产红薯味美甘甜,过去由于没有好的销路,农民只能将红薯摆在乡镇的路边卖,或拉到城里批发。“从8月份上市卖到来年3月份,农民要花费大半年时间卖红薯,很辛苦。”冯宇介绍说。

为了让红薯香甜“透”出去,改变被动封闭的销售局面,甘谷驿镇政府组建成立了甘红大学生村官团队。去年3月,甘红团队在微信上试水宣传甘谷驿的特色甜瓜,并利用下班时间和节假日送货进城,帮助瓜农卖了3万元的甜瓜,既打响了甘谷驿的知名度,又得到了农民的认可。

“后来也有一些外地客户想购买,但是我们解决不了长途运输保鲜的问题,还是局限在周边地区销售。”冯宇说,延安市商务局提出电子商务进农村的设想后,他感觉这是一个好的平台和机遇。红薯上市后,甘红团队开始通过网络销售红薯,还与大美延安等电商合作,帮助农民卖红薯。

“信访局长”张云泉:

“从我们身上看到共产党好”

张云泉已经退休多年,但依然是国家信访局特聘信访工作研究员。“信访局长”,是人们对他的称呼,是他此生的符号和荣誉。

张云泉曾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的一员,1983年转业到江苏省泰州市信访局工作,在信访这个“机关第一难”的岗位上,张云泉整整工作了26年。他用心倾听群众的呼声,用情温暖一颗颗委屈的心灵,用正直和勇气维护百姓利益,真正做到了为民解难、为党分忧,在党和群众之间架起了一座连心桥。

人不伤心不落泪,人无难事不上访——这是张云泉工作多年的深刻体会。正因如此,上访百姓成了他生活和工作中的牵挂。张云泉有一个活页记事本,每个需要帮助的人和事他都记在上面,帮助了一个,就扯掉那一页。26年里,已经记不清帮了多少人,也不知道扯掉了多少页。

平均每天工作12个小时以上,每年批阅落实人民来信2000多封,接待群众

2000多人次……从张云泉同事提供的数字,大概可以知道他的工作量。

信访局工作,平时碰到的尽是烦事、难事和窝囊事,听到的多是骂声、哭声和埋怨声。张云泉为什么能在信访工作岗位做到20多年如一日、热情如初?问及这个话题,张云泉就会回忆起当年在海军服役时的一段经历——

那是一个“七一”的晚上,舰艇抛锚在大海中,远处的城市灯光点点,就像天上的繁星。指导员对全舰官兵说:“你们看看,大后方的人民之所以能在这样一个夜晚享受和平与安宁,就是因为有我们海防战士在前面站岗。万家灯火,万家温馨就是我们海防战士的幸福与境界!”

张云泉动情地表示,这句话影响了她的一生。在信访局长这个岗位上,他感觉也像守卫在海防前线一样,虽然自己承受着很多,但换来的是更多人的幸福、社会的安宁。

为了帮助上访群众解决问题,张云泉

常常要跑好多冤枉路,受好多冤枉气,甚至身上留下了累累伤痕——因为有些上访对象的不理解,情绪激烈,张云泉的腿上留下了10多处踢伤的痕迹,胸前留下了多处抓伤的疤痕,一根手指被咬得露出骨头而不能灵活弯曲,左眼被打成重伤留下残疾……

面对委屈,张云泉没有沮丧和退却;在一次次激烈的突发事件面前,张云泉总是挺身而出。一次,某改制企业老板与职工群众发生冲突,双方对峙多时,老板失去耐心,欲强行开推土机进厂,紧急关头,张云泉一个箭步跨到推土机前,大声喊道:“谁要过去,就先从我身上开过去……”

张云泉常说,为了化解社会矛盾,党员干部必须要有高度的责任心,必须迎难而上,要到现场处理一般人不愿处理的难事、烦事和窝囊事,吃常人不能吃的苦,受常人不能受的冤枉气;只有放得下架子,扑得下身子,受得了委屈,才能赢得群众的理解和感情,才能换来社会基层稳定。

为民解难、为党分忧,不仅体现于张云泉亲力亲为、无私奉献,也表现于他对党的作风建设的严肃思考和呼吁。他说,社会上许多不安定因素的产生并发展成群体性事件,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少数干部忘记了党的宗旨,少数干部不是为人民谋利益,而是在与民争利。“要解决这些问题,关键是要真正做到在党忧党为党,从思想深处认识‘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

多年来默默无闻的付出,张云泉和他的同事在信访岗位上赢得了民众信任。张云泉表示,这是他享受到的最幸福的回报。

“信访工作,说到底就是党的群众工作,就是要在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之间架起‘连心桥’,我就要当好‘连心桥’上的一块砖。我最大的满足,就是让人民群众从我们身上看到共产党好!”张云泉说。

文/新华社记者 朱旭东 (新华社电)

疑与责难,有人说她“死守着洞窟,反对旅游,有钱不会赚”。

“我不反对旅游,但前提要保护好。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我们得感谢、敬畏老祖宗给我们留下了这么多优秀的遗产。”说到这里,身材瘦小的樊锦诗,突然坐直了身子。“一边要向文化遗产负责,一边要向游客负责。敦煌研究院在想尽办法,让游客在莫高窟看好、看舒服,但绝对不会放弃保护。”

对于自己的付出与努力,樊锦诗表示,自己是“接了一次接力棒,做了一个过程”,遗产保护仍需一代代人推动发展。认为自己离开院长职位后,“要做点自己该做的事了”。

她说的“该做的事”,是指规模达到100卷的敦煌石窟考古报告的编撰工作。

2011年,第一卷《莫高窟第266~275窟考古报告》出版发行。两分册8开780页的报告,运用文字、测绘、摄影等手段,逐窟记录了洞窟位置、结构、保存状况等,是洞窟最翔实的档案资料。

“算是一种回归吗?”记者问。

“对。考古报告是每个考古人最基本的工作。好看不好看,都得原原本本记下来。搞研究不是开会,必须静下心来做,板凳不怕十年冷。”

“到了我这个年龄,就会感觉到,人生其实很短。国家培养你,你就要为社会做点事情。大家伙都努力做点事情,社会才会进步,自己也算没白来世上一趟。”樊锦诗说。

文/新华社记者 张玉洁 (据新华社电)

民族脊梁

“敦煌女儿”樊锦诗:

用一生去守望

日前,结束了3个多小时的讲座,78岁的樊锦诗和数十位北京大学学生在敦煌研究院前合影留念,日光灼烫依然。

这个时节的敦煌,下午6点半的太阳还称不上夕阳。

“你们才十八九岁吧?我刚到莫高窟那会儿,24岁了,现在想想,那时真是小啊!”忆起半个多世纪前的往事,平日看似严肃的樊锦诗,眼神里涌出许多温柔。

1962年,北京大学考古系学生樊锦诗第一次来大漠之边的敦煌莫高窟实习。“看一个窟就说好啊,再看一个还是好啊。说不出来到底有多大价值,但就是震撼、激动。”

此后的50余年,她与莫高窟相生相融,再也分不开。2015年3月从敦煌研究院院长一职卸任后,她没有返回故里上海,而是留在了敦煌。讲座、研究、学术会议……日程排得满满当当。

实习完的次年,樊锦诗大学毕业,来到敦煌研究院工作。那时,虽然“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近20年,但敦煌的生活环境仍然异常艰苦。“炕是土的,桌子也是土的,坐的凳子全是土的。房顶是纸糊的,半夜会有老鼠掉在炕上。”

毕业1年后,在武汉大学工作的彭金章来敦煌看望恋人樊锦诗,发现她变了。“变土了,变成敦煌的人了,哪像上海姑娘?”

然而,与恋人“三年即返”的相约期满后,樊锦诗没走。1000多年来,能工巧匠藏于735个洞窟中的艺术珍宝,将她牢牢吸引。常书鸿、段文杰两位先生筚路蓝缕开拓的敦煌研究保护事业,让后继者“小樊”深感肩负重责。

樊锦诗潜心于石窟考古研究工作。她运用考古类型学的方法,完成了敦煌莫高窟北朝、隋及唐代前期的分期断代,成为学术界公认的敦煌石窟分期排年成果。由她具体主持编写的26卷大型丛书《敦煌石窟全集》成为百年敦煌石窟研究的集中展示。20多年过去,1986年,丈夫彭金章放弃了武汉的工作,与她一起守护敦煌。

1998年,樊锦诗担任敦煌研究院第三任院长。一个尤为迫切的命题摆在她面前:在自然环境破坏、洞窟本体老化与游客蜂拥而至的三重威胁下,如何让这些存留千年的脆弱艺术瑰宝“活”得更久?

一个大胆的构想在樊锦诗心中渐渐

清晰起来——为每一个洞窟,每一幅壁画、每一尊彩塑造立数字档案,利用数字技术让莫高窟“容颜常驻”。

2008年底,莫高窟保护历史上规模最大、涉及面最广的综合性保护工程开始实施。除崖体加固、风沙治理等基础性工程外,还要完成莫高窟149个A级洞窟的文物影像拍摄、加工处理和数据库建设,建设敦煌莫高窟游客中心,通过数字电影等现代展示手段,给观众提供了解敦煌的全新视角。

“不同于修修补补,数字化本身就是预防性的。把洞窟的信息采集下来,通过影像永久保存。几十年来,我们花的力气越来越多,步子迈得越大。”樊锦诗说。

2014年8月,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运行,“总量控制、在线预约、网络支付、前端观影、后端看窟”的旅游开放新模式开始实施。2016年4月,“数字敦煌”上线。

实施过程绝非一帆风顺。首先,信息采集量极大,仅实现一个300平方米壁画的洞窟数字化,须拍摄4万余幅照片,并需要繁复拼接,而莫高窟的壁画总面积多达4.5万平方米;另一方面,要面对各种质